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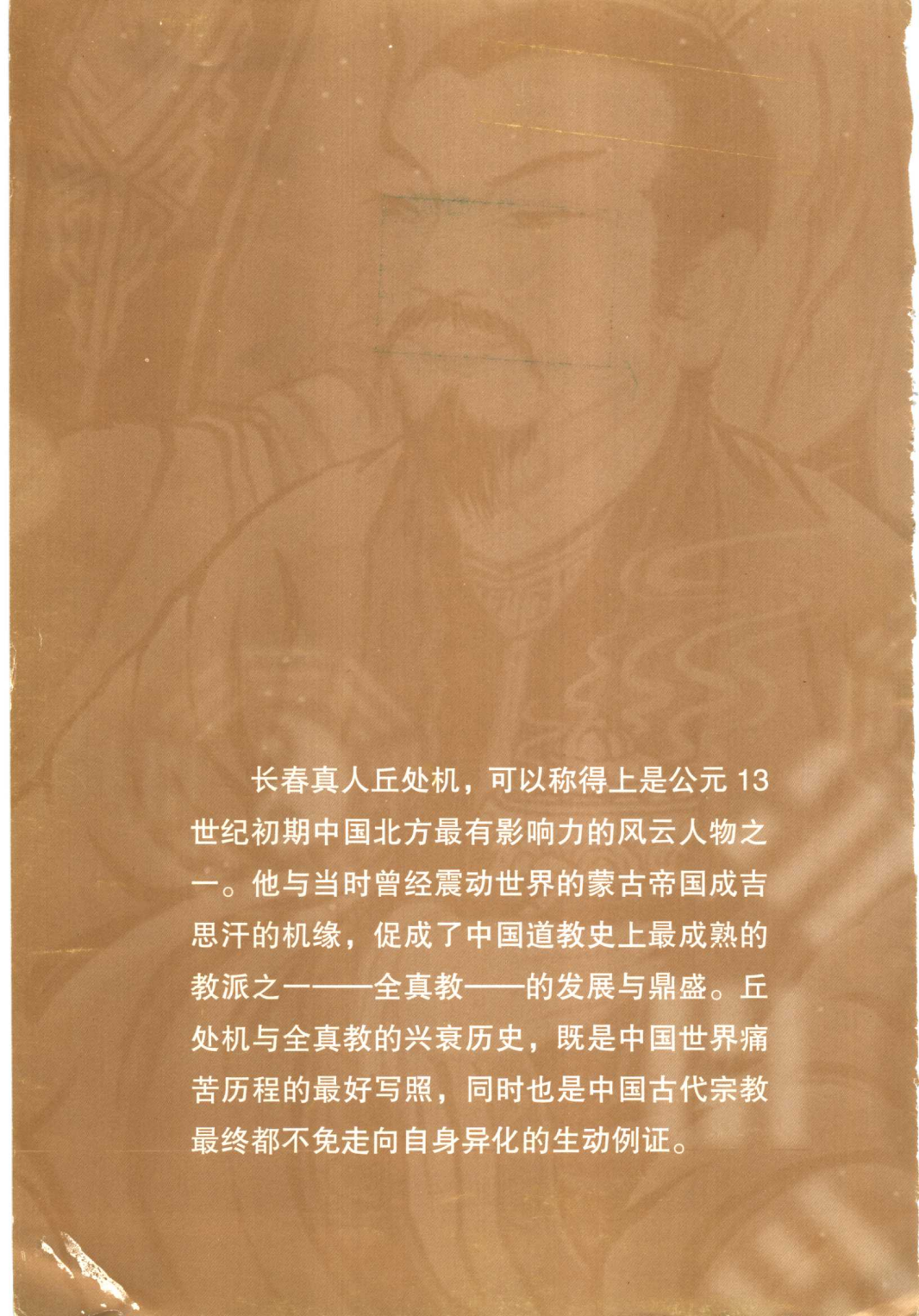
丘处机

赵益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丘处机

赵益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书 名 丘处机
著 者 赵 益
责任编辑 蒋卫国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5 插页 2
印 数 1—5 050 册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338—5/K·343
定 价 12.5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长春真人丘处机，可以称得上是公元 13 世纪初期中国北方最有影响力的风云人物之一。他与当时曾经震动世界的蒙古帝国成吉思汗的机缘，促成了中国道教史上最成熟的教派之一——全真教——的发展与鼎盛。丘处机与全真教的兴衰历史，既是中国世界痛苦历程的最好写照，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宗教最终都不免走向自身异化的生动例证。

目 录

生 前 事

第一章	艰难时世	3
第二章	祖师王重阳	31
第三章	清修岁月	62
第四章	存无为而行有为	86
第五章	西行	112
第六章	雪山论道	149
第七章	生存是否就是目的	177

身 后 事

第一章	全真道	205
第二章	世纪之辩	228
第三章	结局	264

生前事

面对生之痛苦与死之悲哀，人生的道路不外三种。第一是逍遥自得，游戏人生；第二是忧惧悲叹，哀惋痛悼；第三是砺行精进，度己度人。

第一章 艰难时世

过去容易被人淡忘,然而过去又常常会被人提起。这是因为平淡的生活使我们度日如年,而艰难困苦遭遇又会使我们刻骨铭心。回首苍茫,姑且不去提那遥远的幽缈之世,就文献所载记忆所及,中国历史上那些痛苦的时代简直太多了,多到无法一一细数并且让我们麻木的程度。可尽管如此,终究还是有一些苦难会浮出沧桑,涌上心头,挥之而不能去。虽然回忆常常令人失望,但正因为回忆,才使我们相信我们原来有责任去拒绝继续失望。

就整个中国世界而言,公元 12 世纪实在就是一段最为困苦的岁月。因为在这前后一百多年间,中国的苦难从自古以来各个民族争取民生的斗争,渐渐变成了几个民族大规模的对抗交融,而这种对抗交融最终又化为几个政权之间单纯的相互倾轧。这些王朝政权兴衰相替,各有悲欢得失,但无论对哪一个民族的普通百姓而言,却总是一种不可逃避的轮回和无穷无尽的苦难。生活的艰难造成了对生存的渴望,生存的渴望又造就了对皇权的偏执,并使这种偏执的合理性得以长期存在。有多少人为了他们的生命,而一直都未能从这个偏执中醒悟过来?

不可避免的是苦难

姑且就从这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开始。

经过一场历时数十年惊心动魄的斗争，汉族正朔宋王朝以彻底失败而避地南方，确切的时间应该是宋绍兴二年的旧历二月，宋高宗成功躲避了南下金兵的追击，回銮临安之后。但众多史籍大书特书的却是五年前的一天：宋靖康二年，亦即金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夏四月初一。在这一个历史时刻，黄河以南最大的城市汴梁，阳光虽然依旧灿烂，但空气却异常混浊，一行清泪落在飞舞的飘絮中，不起一点声息。一队浩浩荡荡的骑兵正驶往北方。尘埃里可以看见一个身影头顶青色毡笠，在团团簇拥中缓缓而进，一袭宽袖遮住了流泪的面庞，却遮不住孤独中的无奈、恐惧和一腔悲哀。这便是亡国之主道君皇帝宋徽宗，和他的儿子兼嗣君钦宗以及王子皇孙、妃嫔媵嫫，同为入侵的金人掳俘北迁。北行路上，尸骨脓血，异处纵横，在夏日的蒸熏下，臭闻数百里¹，于是这位青笠楚囚不免又一次掩面长号，哀恸无主。悲哀的是，这些痛哭并非完全是为了那些横遭涂炭的无辜生灵。

正是由于这个变故，才使得在临安有了一个新的朝廷。一如旧例，历史学家为这个朝代的名号恰当地加上了一个方位词，称之为“南宋”。尽管自古以来，这些朝代之所以被史家修饰名号，往往是出于时间或空间上相互区分的需要，以有助于史书记事，似乎与其本身实质无关。但东西南北毕竟与一个“中”字有别，或许在某种潜意识里，最为强调正统观念的中原王朝的史家们，也并不完全承认一个单一的民族或一个偏安的地区政权就可以代表整个中国。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辽国则被迫西迁。这个最先在北方强大起来的民族政权过早地衰落，显然是它没能及时占领中原的缘故。在宋、金的夹击下，它

在 12 世纪 20 年代中期丢失了自己的皇帝和几乎整个国土及人民。多亏有一支部落决然西走,方得以避开强大的敌人,在辽阔的亚洲内陆维持了国祚,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同样,中国在元代以后便称之为“西辽”,而穆斯林和西方史家则称之为“哈刺契丹”²。虽然这个王朝暂时脱离了中国社会,不过从血脉渊源上来说,这个美丽和神秘的国度仍然还算得上是中国大家庭的一员。公元 12 世纪中叶,西辽帝国的直辖疆域包括以其首府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为中心的忽章河、垂河(今锡尔河、楚河)上游、热海(今伊塞克湖)周围地区,北至亦列河(今伊犁河),南至忽章河中游,西至塔拉斯河,东至热海以东地区。附庸国有东、西喀喇汗国、高昌回鹘王国、花刺子模国;此外还有一些附庸部族居住地。³大致范围包括了今天的中国新疆和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大部,以及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共和国的部分地区,几乎相当于今天意义上的中亚地区。请不妨记住这个对中原地区来说十分遥远的西方世界,因为我们本书的主人公正是在那里完成了生命最辉煌的一页。

西边由党项族建立的夏王朝仍然在延续,在疆域方面甚至还略有扩大,不过它的势力已渐渐式微。党项部落首领李继迁在公元 986 年曾一度降辽且成为辽国的女婿,四年后又接受了宋朝的册封而改姓赵⁴,颇有些无可奈何的感觉。其孙元昊建国后,与宋、辽战和相继并最终依附于辽,俨然也是一种在夹缝中为生存苦苦而战的状况。虽然它与宋、辽王朝和和战战将近数十年,甚至是无日不以兵戎相见⁵,但从结果上看,它与周边王朝的作战似乎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原则争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场经济利益的战争。这从最后的结果可以明显看出:北宋庆历四年(1044 年),宋帝被迫承认夏国存在的合法性,并以巨额的岁币和恢复贸易的条件换取了和平。事实上,从北宋宝元元年(1038 年)正式立国起,夏国便已经融入到了中国文化的大家庭中,经过百多年的陶冶,蕃汉之

学融合交会,先进的中原学术便成为主体,夏国文化因之而颇有建树。到了本世纪初,辽国被金国所灭,夏国转附于金,乘着金、宋交战的空虚之时,获得了不少领土。文明的进步便意味着放弃野蛮的抄略和血腥的杀戮,因此夏国虽然在当时仍然独霸一方,但其实质与宋朝一样,最终趋向于柔弱。

夏国以西的吐蕃,也是唐代中国的一员。然而这个强大的王朝同唐一样崩溃于9世纪,只留下诸多部落教派退保故土,已经有百多年没与中原王朝发生关系。但这仍然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还是不可避免地重新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我们必须同样先记住这一点,因为吐蕃和本书的主人公以及他的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没有吐蕃,也就没有了后来发生的这许多故事。

相对于吐蕃而言,同样是唐代中国成员的南诏则要幸运得多。因为处于边远南疆,这个民族政权一直相对平和,宋以后此地称为大理国。大理朝廷虽不常来走动,但亦时有供奉,与宋的关系最为和睦。这也是事出有因,一是该地民生状况相对较好,二是文化上有相当的认同,再加上宋朝的藩蔽作用,它是没有理由向其宗主国挑衅的。自然,这个时期大理国的国力也已经与早先的南诏不可同日而语,在这个适者生存的时代,尽管拥有独特的地理优势,这个小国的命运显然也是岌岌可危的。事实不久便证明了这一点。

于是这个时代的主角便当然是北方女真族建立的金帝国。这个12世纪前半段最为强大的王朝,一开始并不为人所注意,甚至到后来,宋朝人士仍鄙斥它是北方“最微且贱”的一族。⁶这恐怕确实是某种程度上的真实情况,比如这个民族就曾经不得不把自己的族名改作“女直”,因为“真”字触犯了辽国皇帝的名讳。但这个微贱的部族竟然也就打败了统治自己近二百年的契丹辽国⁷,并把自诩为天下正統的宋室赶到了南方,成为中华大家庭中强有力的一员。至少在这个当口,金帝国已经有能力也有资格成为中国的正統王朝了。这确实有些令人吃惊。

“正统”问题自古就是一个微妙的话题，也是一个中国世界的知识分子们每时每刻都需要讨论的关键。早先的理论是所谓“五德终始”说，始作俑者是战国时期的齐国人邹衍。⁸彼时的齐国是一个奇士辈出之地，单是有“邹子”之称者便有三位，前有邹忌，后有邹奭，邹衍则是其中最著名者。此人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著《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五德终始不过是其中之一端。⁹这是一种十分有趣的学说，它首先承认王朝德运有始有终，其次是断言金木水火土五德运转交替，相胜相克，各有年次，分主天下。总体上看，便是“德”各有其“运”，随五行相胜而转移。¹⁰显然，这既为革命奠定理论基础，又为王朝兴替给出了一定的时间限制，颇为圆滑而实用。任何一个入主天下的王室都可以从中为自己编造出正当的理由，同时每一位史家也都可以据此断定无道王朝的僭伪与荒谬，无论你是东西南北还是夷狄蛮戎。可以说，这一理论是中华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大家庭的基本因素之一。但到了宋代之时，观念有所改变。

死于公元 1086 年的宋朝名臣、大史学家司马光认为，只有使九州合为一统者，方可以称得上是天子；仁暴强弱、授受相替、中夏方外等等标准，皆不足以定历代之正闰，所谓帝王非四海一家者不为正统。¹¹持相近之说者，同时还有当时的很多著名人士，比如欧阳修和苏轼。与其说这是一个不带偏见的历史观点，倒毋宁说它是一种来源于现实又可以作用于现实的政治理论。在分裂的时代，统一和融合是最主要的，历史学家在以史为鉴时不可能不意识到这一点。忧患意识极为深重的宋人首先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

但是金国的最高统治集团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有事实表明，金人直至他们第六位皇帝才正式定下了大金王朝应该承接宋之火运而为土德，比起历朝历代开国伊始就确立正闰，这简直就像是儿戏。虽然这从实际效果上来说是一个小节，但至少反映金廷上下显然一开始就没能以正统帝国的要求来规范自己，下定决心

用励精图治的刻苦去换取一个大一统的盛世,就像后来的蒙古人一样。太祖完颜旻(阿骨打)意在推翻辽国,太宗完颜晟(吴乞买)意在北宋两河与陕西,后世诸帝则意在守成,充其量也只得把疆域推向了淮河。只有第四位皇帝完颜亮是惟一的例外,但这位淫暴的君主徒有统一天下的大志,却丝毫也没有包容四海的仁德与韬略,最后竟不免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他的豪迈诗句“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¹²,不过成为后人的笑柄。结果,金人仅仅在达到一定高度后便止步不前了,这正是他们此后悲剧的一个根源所在。可现在,公元12世纪初叶,金帝国还是当然的主角。

直至攻破宋朝首都汴京之时,金人尚没有摆脱其景祖乌古迺所奠定的部落联盟性质,它的制度还十分落后,距一个先进国家政权的要求还相差甚远,但其强大的战斗力却不容忽视。这来源于女真族人不甘统治的反抗精神和严密的军事化组织。值得一提的是后者,历史学家称之为“猛安谋克”,从中颇可以看出金人的兴起当绝非偶然。女真语中,“猛安”、“谋克”是“千夫长”、“百夫长”的意思,这两个名称合起来就表示一种独特的军事组织形式。在金朝初期,诸部之民壮者皆兵,平时佃渔射猎,有事则各部酋长征兵集取,组成军队¹³,亦即所谓的“缓则射猎,急则出战”¹⁴。最初是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行军布阵一如出猎,金人极为擅长这种由围猎而演化过来的作战方式。“猛安谋克”的组织内容在功用上类同于唐以前的保甲、屯田制,但实质上则完全不同。原因在于它根本就是一种氏族社会时期的部落形态,本由其生产方式所决定,只不过是后来发展中,渐渐变成了一种政军合一的严密组织罢了。因此,它始终充满着原始氏族的团结昂扬的精神,勤劳刻苦,生气勃勃。在公元1114年十一月的一次战役中,十万辽兵竟然被三千七百金人所击败。也正是从此时开始,金人的正式部队也才刚过万人¹⁵,其强劲的战斗力的于此可见一斑。盛极而败的辽王朝之后,

右文偃武而衰朽不堪的宋人,当然更不是它的对手。女真攻灭北宋的总兵力在六万左右¹⁶,围攻汴梁的人马则不过五万人,而当时守城的宋朝禁军数量,至少是它的几倍。

百多年后曾有史家总结过金人成功如此迅速的原因,代表性的结论是这样三句话: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侄,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后一句说的是猛安谋克,中一句说的是人多俊杰,而第一句则重点提出了女真族的民族赋性。女真是古肃慎族的后代,《三国志》称之为“挹娄”,元魏时称之为“勿吉”,属于唐时的黑水靺鞨,世居混同江之东长白山下,鸭绿江源头。契丹兴起后,居于混同江之南的女真人属服契丹,被称为“熟女真”,居江北者则称为“生女真”,虽也受治于契丹,但并未隶籍。生女真各部所居之处地狭产薄,惟有苦耕苦战,方能生存。劳其筋骨,苦其心志,故能将勇志一,兵精力齐,一旦奋起,遂变弱为强。¹⁷

但领袖的因素永远是最主要的,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开辟之功绝不容忽视。他不仅仅是与历史上许多开国皇帝一样,自小就有一种超越常人的天分,更主要的是他具有足以兴起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智慧与勇气。传说他将生之时,河水为沸,野兽尽噪;降临之际,光照户室,部落咸异。长大之后,臂垂过膝,身長八尺,状貌雄伟,沉毅寡言¹⁸,……如此等等。但与他此后纵横捭阖的经略之举相比照,这些传说仍然只不过是一种善意的谎言而已。阿骨打的才智绝不是完全天赋的,生活经历教会了他一切,他同样是一位敢于放眼寰宇并能从中获得真知的人,这样一种英雄的出世是一个民族激动人心的成就。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一点:金人初无文字,国势日强后,与邻国交往却不得不用契丹文字。于是阿骨打便命令一位聪明的宗族将领完颜希尹仿照汉文楷体字,因循契丹文字制度,会合本族语言,制成了女真文字。¹⁹仓颉造字,天雨粟而鬼夜哭,这又岂是中原先民的幸运而已,而可以说是任何民族成熟的标志。知子莫如父,阿骨打的父亲劬里钵早就预言,结束辽朝统治之

大任,惟有次子阿骨打可以当之。

公元 1113 年,阿骨打在其兄去世后,袭位“都勃极烈”成为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勃极烈”为女真语“勃堇”的音讹,是“部落长”的意思,“都勃极烈”亦即“都勃堇”,就是诸部之长。这一勃极烈名号是阿骨打的首创。他还创立并设置了各种勃极烈头衔,分掌不同事务。²⁰勃极烈制虽不系统完善,却是女真初期的主要政治制度,与“猛安谋克”军事组织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机整体。

在阿骨打成为都勃极烈的前一年,辽天祚帝照例出巡混同江捺钵。所谓“捺钵”,实际上就是辽帝行营所在地。辽人毕竟还是一个游牧民族国家,所以尽有长城内外广袤之地后,仍不免沿袭当年随水草、就畋渔之旧习而秋冬违寒、春夏避暑。契丹大汗一年中春秋两季各出巡一次,行在即谓之“捺钵”,春捺钵也称“春水”,主要活动是凿冰钓鱼,放鹰鹞,捕鹅雁,并举行头鱼宴、头鹅会。在这一年的头鱼宴上,诸部首长无不循规蹈矩,可完颜阿骨打却当着辽帝的面表现出一种极其不恭的态度,显示出其反辽的决心已非常坚决。这使得辽天祚帝一度想要杀掉阿骨打,但由于种种因素没有付诸实施。²¹果然两年时间不到,阿骨打便率领女真族开始了走向历史的进程。征服与反征服总是极其残酷的,对于一个刚刚兴起的被压迫民族而言,其被压迫的程度有多么深重,其反抗的程度便有多么激烈惨怛。

现在看起来,阿骨打的最主要成就是使女真的部族组合更加紧密而强大,这包括加强猛安谋克组织,完善官制,接受中原文化,以及巩固和密切家族内部的团结等等。对于后者,当时的记载有非常详细的描写,说他们“君臣晏然之际,携手握臂,咬头扭耳,至于同歌同舞,莫分尊卑而无间”,所以就像禽兽一样,“情通心一,各无觊觎之意”²²。

说起来令人奇怪,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知乎礼义,然而不幸的是,很多人一旦知道礼义,却往往变得六亲不认。相比之下,

辽、宋大国当然是礼义之邦，因为不是禽兽，自然也就情不能通，心不能一，所以辽国大军一战即溃，而宋廷硕果仅存的宗室血脉康王赵构，则快马加鞭地逃往南方，全然不顾他的父兄在遥远的北国坐井观天。

金与辽、宋之间决定性的战争加起来只持续了十二年不到的时间，看起来似乎是金帝国摧枯拉朽，辽、宋王朝不堪一击，但其中仍有很多细节，包含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因素。不过从整体上看，历史的偶然总是某种必然的体现，如果从时间进程上着眼的话，这甚至就可以算得上是一条金科玉律了，所以用不着后人多费口舌。然而女真人偏处北隅的闭塞造成了一种相对固执的心态：对土地、奴隶、牲口、金帛有着强烈的贪欲。这固然是落后民族一贯的禀性，也正是这种物质欲望推动他们走向文明，原本无可厚非。不幸的是他们灭亡辽国之后，面临着的毕竟是一个强大的文化以及先进的生产方式，在金戈铁马扫荡一切的洪流下，假如不能及时融入先进的文明而改弦易辙的话，这个民族的革命便会给历史带来某种程度的倒退。

显然，沧桑之世已不可避免。

大金帝国

公元1123年，金兵已经攻下辽国南迁后的首府燕京，辽已濒临灭亡。完颜阿骨打死于这一年的五月²³，享年五十三岁，照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但严格而论在位只有六年，作为一国君主的时间并不很长。说起来这位英雄的死亡似乎是可以避免的，原因是阿骨打在攻入燕京后，掳携中原士大夫之家姝姬丽色、光美秀媚者共二三千人北归，终日酣歌宴乐，惟知声色之娱，不久，形神俱病。²⁴此后在北追辽天祚帝的途中，死于军中。其弟吴乞买继之，改元“天会”，后来的庙号为太宗。吴乞买又称吴乞马、乌奇迈，金未灭辽之

前,人名皆本其民族语言而制,以汉字音译,所以有很多的不同。及至金人入主中原,渐通汉文,于是又用汉字制名,因此太祖又名完颜旻,而太宗的汉名则称完颜晟。

太宗即位后,与宋廷在关于夹攻辽国得手后利益方面的讨价还价最后酿成了战争。战事最初发生在平州一带,可以算得上是灭辽后金、宋之间的第一场流血冲突。此后就是两度进攻东京汴梁,横扫河、淮及陕西。应该说,金人对原辽国疆域及其周边各族的总体政策仍是以安抚救济为主的,比如在建国的第二年大破辽兵后,因为四方降者甚众,阿骨打就曾下诏,对契丹、奚、汉、渤海、辽籍女真、室韦、达鲁古、兀惹、铁骊诸族官民,悉皆免罪,命其酋长为金国官吏,并使从宜居处。²⁵太宗即位后,也继续分赐土地,减轻赋税,并救赈灾饥,以安处四方降人。然而金兵在此前后对河北、河南、山东乃至陕西地区进行的攻伐中,却采取了血腥屠杀和奴役统治为主的做法,结果使中原遭受重创。

长城内外的民族永远是唇齿相依的。北面的游牧之族受气候的影响绝大,所以为生存而不得不攻伐抢掠;南边的田园民族则独赖地利自耕自给,虽然怀着满腔爱心招徕远人,但也无法超出自己承受的范围,于是战火不免。看起来中原总是饱经苦难,但其实也是有失有得,没有外来的交融,江河又何能绵绵不绝?泰山又何能成其壮大?所以一道高墙实际上就是一条纽带,尽管这条历史的纽带伤痕累累,满目疮痍。

初起的女真族对中原的损害正是这一规律的产物。新兴之族总是只知道奋起一击,尚不懂得理解的伟大,因而灾难性的后果又岂能避免。金人所称之“汉人”,指的是原契丹地区的北方汉民,而对河南、山东地区的宋人,金人则称之为“南人”²⁶。很明显,游牧民族对于较先进的农耕文明,起初总是不以为然的,虽然最终他们甚至是无条件地接受了这种文明的熏染,但其中的过程却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由于缺乏天下一家的最高理想,因而从太祖到太宗以